

林 大 斯
與德國作家
路得維希的談話



斯 大 林

與德國作家
路得維希的談話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540

斯大林

與德國作家路得維希的談話

曹葆華 徐芝延校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13,000
印數：1—10,000

一九五四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曹葆華 徐芝延校譯

И. В. СТАЛИН

БЕСЕДА С НЕМЕЦКИМ ПИСАТЕЛЕМ
ЭМИЛЕМ ЛЮДВИГОМ

—— ——— ——— ——— ——— ———
本書譯自「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三卷。

與德國作家路得維希的談話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路得維希：承您設法接見，我實在非常感謝。我研究卓越歷史人物底生平事業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我覺得我是很會鑑別人物的，可是對於社會經濟條件，我却一點也不懂得。

斯大林：您太謙虛了。

路得維希：並不是謙虛，這是實在情形。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將向您提出一些也許您會覺得奇怪的問題。今天我在克列姆里宮這裏看見了彼得大帝底某些遺跡，而我想向您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您是否允許把您和彼得大帝作一比擬呢？您是否認為自己是彼得大帝事業底繼承者呢？

斯大林：絕對不能這樣。歷史的比擬總是有危險的。您作的這個比擬是無意思的。

路得維希；但是要知道彼得大帝爲了發展自己的國家，爲了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國來，曾經做過很多事情。

斯大林：當然是這樣，彼得大帝爲了提拔地主階級和發展新起的商人階級，曾經做過很多事情。彼得大帝爲了建立和鞏固地主與商人底民族國家，曾經做過很多事情。同樣也應該說：提拔地主階級，幫助新起的商人階級以及鞏固這兩個階級底民族國家，是靠拚命剝削農奴來進行的。

至於我呢，却不過是列寧底學生，而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不愧作他的學生。

我一生從事的任務，就是要提拔另一個階級，即工人階級。這個任務並不是鞏固什麼「民族」國家，而是鞏固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鞏固國際性的國家，而且只要鞏固這個國家，就是幫助鞏固整個國際工人階級。假如我在提拔工人階級和鞏固這個階級底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工作中，有任何一個步驟不是爲了鞏固和改善工人階級底狀況，那末我就認爲自己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

可見，您的這個比擬是不適當的。

至於說到列寧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不過是滄海中的一粟，而列寧却是整個的

汪洋大海。

路得維希：馬克思主義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卓越作用，您却承認歷史人物底卓越作用，您是否看出唯物史觀和您的這種見解之間有着矛盾呢？

斯大林：不，這裏並沒有什麼矛盾。馬克思主義決不否認卓越人物底作用，決不否認歷史是由人們創造的。在馬克思那裏，在他的「哲學底貧困」及其他著作中，您可以找到這樣的話：正是人們創造歷史。但是人們創造歷史，當然不是按照什麼幻想，不是隨心所欲。凡是新的一代都碰到早在他們誕生時候即已具備的特定條件。偉大人物之所以有一些什麼價值，只是因為他們善於正確了解這些條件、了解如何改變這些條件。如果他們不了解這些條件，而想按照自己的幻想來改變這些條件，那末他們，這些人，就會陷入唐·吉訶德三底境地。因此，正是依據馬克思，完全不應該把人們和條件對立起來。正是人們創造歷史，然而只有在他們正確了解他們所碰到的現成條件的時候，只有在他們了解如何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才創造歷史。至少，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了解馬克思的。而我們研究馬克思已經幾十年了。

路得維希：大約三十年前，當我在大學唸書的時候，有許多自命為唯物史觀信徒的

德國教授向我們鼓吹說：馬克思主義否認英雄底作用，否認英雄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

斯大林：這是一些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人。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英雄底作用。相反地，馬克思主義承認這種作用是很大的，不過附有我剛才所說的那些條件。

路得維希：在我們面前這張桌子周圍，擺有十六把椅子。在外國，一方面，人們知道，蘇聯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在這裏一切都必須由集體來決定；而另一方面，人們知道，在這裏一切都是由個人決定的。究竟是由誰決定呢？

斯大林：不，個人是不能決定的。個人的決定總是或幾乎總是片面的。在每個委員會裏，在每個集體組織裏，都有一些人，他們的意見是必須加以重視的。在每個委員會裏，在每個集體組織裏，也有一些人，他們是能發表錯誤意見的。根據三次革命底經驗，我們知道：在一百個未經過集體審查和集體修改的個人決定中，差不多有九十個是片面的。

在我們的領導機關中，在領導我們蘇維埃和黨的全部組織的我們黨中央委員會中，有約近七十個委員。在這七十個中央委員中，有我們優秀的工業家，有我們優秀的合作事業家，有我們優秀的供應家，有我們優秀的軍事家，有我們優秀的宣傳家，有我們優

秀的鼓動家，有我們優秀的國營農場專家，有我們優秀的集體農莊專家，有我們優秀的個體農民經濟專家，有我們優秀的蘇聯民族事務和民族政策專家。在這個最高機關裏集中了我們黨底智慧。每個人都有可能改正任何個人的意見和提議。每個人都有可能貢獻自己的經驗。假如不是這樣，假如決定是由個人作的，那末我們在自己工作中就會犯極嚴重的錯誤。既然每個人有可能改正各個人的錯誤，既然我們重視這些改正，所以我們的決定是相當正確的。

路得維希：您曾經做過幾十年的秘密工作。您曾經秘密地輸送過槍械和書報等等。您是否認爲蘇維埃政權底敵人會借用您的經驗，也以同樣的方法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呢？

斯大林：這當然是完全可能的。

路得維希：您們的政權在與敵人鬥爭中之所以嚴厲和無情，其原因是否就在這裏呢？

斯大林：不是，主要的原因並不在這裏。可以舉出幾個歷史上的例子。當布爾什維克取得了政權，他們最初曾經以溫和態度對待敵人。孟什維克繼續合法地存在並出版自己的報紙。社會革命黨人也是繼續合法地存在並有自己的報紙。甚至立憲民主黨人也繼

續出版自己的報紙。當克拉斯諾夫將軍^(三)向列寧格勒進行反革命的進攻並被我們俘虜了，按照軍事時期的條件，當時我們至少是可以把他囚禁起來的，而且我們是應當把他槍斃的。但是我們「憑着諾言」把他釋放了。結果怎樣呢？不久就弄明白了：這種溫和態度只是毀壞蘇維埃政權底堡壘。我們當時以這類溫和態度來對待工人階級底敵人，我們是犯錯誤了。假如我們後來重複這個錯誤，那末我們對於工人階級就犯罪了，我們就出賣工人階級底利益了。而這一點很快就完全清楚了。不久就弄明白了：我們對我們的敵人愈溫和，這些敵人對我們的反抗就愈大。不久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戈茨^(三)等人與右派孟什維克在列寧格勒組織了士官生反革命的暴動，結果我們許多革命的海員犧牲了。我們「憑着諾言」釋放了的那個克拉斯諾夫，把白匪哥薩克人組織起來了。他和馬蒙托夫^(三)聯合起來，同蘇維埃政權進行了兩年的武裝鬥爭。不久就弄明白了：站在這些白匪將軍背後的有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底代理人，即法國、英國、美國以及日本底代理人。我們深信：我們採取溫和態度，是作錯了。我們已從經驗中了解到，只有對這些敵人採用最無情的鎮壓政策，才能戰勝這些敵人。

路得維希：我覺得蘇聯有很大一部分居民對於蘇維埃政權懷着恐怖、畏懼，而蘇維

埃政權底鞏固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這個恐怖上面的。我想知道：當您意識到要鞏固政權就得引起恐怖，您個人的精神狀態是怎樣的呢？要知道在對待您的同志時，在對待您的朋友時，您所採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不是引起恐懼的方法，而您在對待居民時則引起恐怖。

斯大林：您錯了。而您的錯誤是許多人都犯過的錯誤。難道您以為可以用威嚇方法、恐嚇方法來維持政權和獲得千百萬羣衆支持十四年之久嗎？不，這是不可能的。沙皇政府是最善於威嚇人民的。沙皇政府在這一方面具有很多舊的經驗。歐洲資產階級，尤其是法國資產階級，曾經以一切方法在這一方面幫助沙皇政府，並且教導它去恐嚇人民。雖然有這種經驗，雖然有歐洲資產階級底幫助，可是恐嚇政策却使沙皇政府瓦解了。

路得維希：可是要知道羅曼諾夫皇朝却支持了三百年之久。

斯大林：是的，可是在這三百年中間曾經有過多少次起義和騷動：斯捷潘·拉辛底起義⁽¹⁾，蒲加巧夫底起義⁽²⁾，十二月黨人底起義⁽³⁾，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我還不說：現在國內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條件，已和舊時的條件根

本不同了，那時候羣衆是愚昧無知的，是沒有文化的，是很馴服的，在政治上是抬不起頭來的，所以當時的「統治者」就有可能比較長期地保持政權。

至於蘇聯人民，至於蘇聯工人和農民，却完全不像您所想像的那樣溫順，那樣馴服和畏縮。在歐洲有很多人拿舊的眼光來看蘇聯人，認爲在俄國生活着的是這樣的一些人：第一是馴服的，第二是懶惰的。這是過時的和根本錯誤的看法。這種看法是過去在歐洲造成的，那時候俄國地主們跑到巴黎去，在那裏揮霍自己劫掠來的金錢，遊手好閒，無所事事。這的確是一些意志薄弱的無用之輩。於是人們就作出「俄國懶漢」的結論。但這些結論是與俄國的工人和農民毫不相干的。俄國的工人和農民過去和現在都是靠自己的勞動來謀得生活資料的。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在很短時期內進行了三次革命，摧毀了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現在正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認爲這些工人和農民是馴服的和懶惰的，那就太奇怪了。

您剛才問過我：在我們這裏是否一切都是由一個人決定的。我們的工人現在決不會而且無論如何也不會容忍個人專政。在我們這裏，最富有威望的人，一旦失去工人羣衆的信仰，一旦失去與工人羣衆的聯繫，就會完全坍台，不值一錢。普列漢諾夫過去享有

非常的威望。結果怎樣呢？一日他在政治上失了足，工人們就忘掉他了，就離開他和忘掉他了。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是享有過很大的威望的，當然遠不如普列漢諾夫那樣大。結果怎樣呢？一旦他離開了工人，工人們就把他忘掉了。

路得維希：完全忘掉了嗎？

斯大林：有時候也想起他，——帶着憎惡想起他。

路得維希：都帶着憎惡嗎？

斯大林：我們的工人，是帶着憎惡、憤怒、仇恨想起托洛茨基的。

當然有某一小部分居民，他們確實是害怕蘇維埃政權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我是指那些正在死亡的、正被消滅的階級底殘餘，而首先就是一小部分農民，——富農。可是在這裏問題不僅是我們對於這些集團的威嚇政策，這種政策確實是存在着的。大家知道，我們布爾什維克在這裏不只限於威嚇，而且還更進一步，從事消滅這個資產階級階層。

但是如果拿蘇聯勞動居民來說，拿佔整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勞動農民來說，那末他們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而且他們絕大多數是積極支持蘇維埃制度的。而他們之所以支持蘇維埃制度，是因為這個制度是替工人和農民底根本利益服務的。

蘇維埃政權牢不可破的基礎就在於此，而決不在於所謂的威嚇政策。

路得維希：我很感謝您這個回答。如果我還向您提出一個也許會使您覺得奇怪的問題，那就請您原諒。在您的生平中有一些所謂的「強盜」事蹟，您對於斯捷潘·拉辛這個人物會否感到過興趣呢？您對這個「為理想而鬥爭的強盜」是抱什麼態度呢？

斯大林：我們布爾什維克對於鮑洛特尼科夫、拉辛、蒲加巧夫等等這樣的歷史人物始終是感到興趣的。我們認為這些人底發動是被壓迫階級自發暴動底表現，是農民反封建壓迫的自發起義底表現。在我們看來，研究這種農民起義最初幾次企圖底歷史，總是很感興趣的。但是這當然不能拿來和布爾什維克相比。個別的農民起義，即使不像拉辛暴動那樣帶有「強盜性」和無組織性，也是不能達到任何重大結果的。農民起義只有在與工人起義結合起來，只有由工人領導的時候，才能得到勝利。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的聯合起義，才能達到目的。

除此而外，在說到拉辛和蒲加巧夫的時候，決不要忘記：他們都是皇權主義者；他們反對地主，可是擁護「好皇帝」。要知道這就是他們的口號。

由此可見，無論如何也不能拿他們來和布爾什維克相比。

路得維希：請允許我向您提出幾個有關您的生平的問題。當我在馬薩里克（²）那裏的時候，他曾對我說他在六歲時就已經意識到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了。是什麼事情而且在什麼時候使您成爲社會主義者的呢？

斯大林：我不能肯定說我從六歲起就已經傾向於社會主義了。甚至也不能肯定說是從十歲或十二歲起的。我參加革命運動是從十五歲起，當時我和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秘密小組發生了聯系。這些小組對我有着很大的影響，喚起了我讀秘密的馬克思主義書刊的興趣。

路得維希：是什麼推動您走上反對政府的立場呢？也許是父母的虐待吧？

斯大林：不是。我的父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可是他們對待我並不壞。當時我讀書的那個正教中學則不是如此。由於反抗正教中學所實行的愚弄人的校規和陰險毒辣的耶穌會的方法，我已經決心成爲而且真正成了革命家，成了真正革命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底信徒。

路得維希：可是您難道不承認耶穌教徒底可取之處嗎？

斯大林：不錯，爲了實現醜惡的目的，他們在工作中具有着系統性、頑強性。但他

們的主要方法是監視、偵探、追查私人秘密、愚弄，——這裏有什麼可取之處呢？例如，宿舍裏監視的情形就是這樣：九點鐘吃茶鈴一響，我們便都到餐廳裏去，而當我們回到自己房間裏，則發現在這個時間內我們所有的抽屜都被搜查和翻亂了……這裏有什麼可取之處呢？

路得維希：我看到蘇聯非常尊重美國的一切東西，甚至還可以說是崇拜美國的一切東西，也就是崇拜金元國家，崇拜最徹底的資本主義國家。貴國的工人階級也有這種情感，不僅對拖拉機和汽車是如此，而且一般地對美國人也是如此。您說這是什麼原因呢？

斯大林：您言過其實了。我們一點也沒有特別尊重美國的一切東西。但是我們尊重美國人在各個方面——在工業、技術、文學、生活各個方面——的求實精神。我們從來沒有忘記北美合衆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但是美國人中間有許多在精神和肉體方面都很健康的人，在對待自己的一切工作和事業方面都很健康的人。我們也同情這種求實精神、這種純樸性。雖然美國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可是美國的工業作風和生產習慣還保持着民主制度的一些東西，至於仍舊存在着封建貴族老爺精神的歐洲各古老資本

主義國家，則不能說是如此。

路得維希：您甚至沒有料想到您說得多麼對。

斯大林：不一定，也許我也料想到的。

雖然作為社會制度的封建主義在歐洲早已被粉碎了，可是不論在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中都繼續存在着很重的封建主義殘餘。封建環境繼續產生技師、專門家、學者、作家，他們把老爺作風帶進工業、技術、科學、文學中去。封建傳統並沒有被徹底粉碎。

關於美國却不能這樣說了，因為美國是一個沒有地主、沒有貴族的「自由殖民者」國家。於是就產生了美國人在生產中的結實的和比較純樸的作風。到過美國的我國工人兼經濟工作人員，馬上就看出了這個特點。他們不免有幾分驚喜地談論道：在美國，在生產過程中很難從外表上把工程師與工人辨別出來。這當然是他們所喜歡的。歐洲的情形則迥然不同了。

但是，如果說到我們同情某一民族，或者更確切些說，同情某一民族底大多數人，那末當然應該說我們同情德國人。我們對美國人的情感是不能與這種同情相比的！

路得維希：爲什麼特別同情德意志民族呢？

斯大林：至少也是因爲它給了全世界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的人。只須確定這是真正的事實就夠了。

路得維希：近來在一些德國政治家中間有一種嚴重的憂慮，認爲蘇聯和德國傳統的友好政策將被廢棄。這種憂慮是由於蘇聯和波蘭的談判而產生的。假如這次談判底結果，蘇聯方面果然承認現在波蘭底疆界，那就會使全體德國人民大失所望，因爲德國人民一向認爲蘇聯反對凡爾賽體系而且不打算承認它。

斯大林：我知道，在一些德國政界要人中間有某種不滿和驚慌，惟恐蘇聯在與波蘭的談判中或者在與波蘭的某一條約中完成了這樣一個步驟，就是蘇聯確認並保證波蘭底領土和疆界。

在我看來，這種憂慮是錯誤的。我們始終聲明我們準備與任何國家締結不侵犯協定。我們已經和許多國家簽訂了這種協定。我們已經公開聲明我們也準備和波蘭簽訂同樣的協定。如果我們聲明我們準備和波蘭簽訂不侵犯協定，那末我們不是爲了說起來好聽，而是爲了真正簽訂這樣的協定。我們可以說是特別類型的政治家。有一些政治家，他們今天約許或聲明一件事，而明天不是忘掉就是否認他們所聲明過的事情，甚至連

臉也不紅一下。我們是不能這樣做的。國外所發生的事情，必不可免地會成爲國內盡人皆知的事情，成爲全體工人和農民都知道的事情。假如我們說的是一回事，而做的是另一回事，那末我們就會在人民羣衆中間喪失自己的威信。波蘭人一聲明他們準備和我們進行不侵犯協定的談判，我們自然就同意了，而且就開始談判了。

從德國人底觀點看來，由此產生的最可憂慮的事情是什麼呢？與德國人的關係會改變嗎？這種關係會惡化嗎？這樣的憂慮是毫無根據的。我們應當而且波蘭人也同樣應當在協定中聲明：我們不會採取暴力和侵犯手段來改變蘇波疆界或破壞它們的獨立。正像我們給波蘭人這個諾言一樣，他們也要給我們同樣的諾言。在條約中一定要規定這樣的一條：我們條約國不得進行戰爭來破壞我們國家底獨立和領土完整。沒有這樣的一條，就不能簽訂協定。沒有這樣的一條，就談不到什麼協定。這就是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事情。

這是承認凡爾賽體系（二〇）嗎？不是的。或者，這也許是保證疆界吧？不是的。正如波蘭過去沒有做過而且將來也不會做我國疆界底保證人一樣，我們過去從來沒有做過而且將來也決不會做波蘭底保證人。我們與德國的友好關係將仍舊和以往一樣。這就是我

的堅定的信念。

因此，您所說的憂慮是毫無根據的。這種憂慮是從某些波蘭人和法國人所散佈的謠言產生的。如果波蘭在協定上簽字，而我們把協定公佈以後，這種憂慮就會烟消雲散。人人都會看到：協定裏絲毫沒有反對德國的東西。

路得維希：我很感謝這個聲明。現在讓我提出下面這個問題：您說到「平均主義」，而且這個名詞對普遍平均制帶有一定的譏諷意味。但要知道普遍平均制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啦。

斯大林：有人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切人可以領取同樣的工資、同量的肉、同量的麵包，穿同樣的衣服，領取同量的同樣的生產品，——這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不知道的。

馬克思主義只是說：在階級還沒有徹底消滅的時候，在勞動還沒有從生存手段變成人們底第一需要、變成爲社會謀福利的自願勞動的時候，人們還是按自己的勞動來領取工資。「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公式，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公式。

只有到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只有在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中，才是每個人按照自己的能力來勞動，每個人按照自己的需要來領取勞動報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各個不同的人現在有，而且將來也有各種不同的需要，這是完全明顯的。社會主義從來沒有否認各個人嗜好的不同，各個人的需要在量上和質上的不同。只要讀一讀馬克思對斯蒂納底平均主義傾向的批判〔二〕，只要讀一讀馬克思對一八七五年「哥達綱領」的批判〔三〕，只要讀一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其他的著作，您就會看到他們是如何尖銳地攻擊平均主義。平均主義底根源是個體農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均瓜分一切財富的心理，是原始農民「共產主義」的心理。平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只有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才能這樣幼稚地設想，彷彿俄國布爾什維克想把一切財富積聚在一起，然後平均瓜分。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的人就是這樣設想的。類如克倫威爾時期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原始「共產主義者」就是這樣設想共產主義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布爾什維克是與這種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毫無共同之處的。

路得維希：您現在抽紙煙啦。斯大林先生，您那引為奇談的煙斗在什麼地方呢？您

曾經說過：言論和奇談日漸消逝，事業則始終存在。但是請您相信，國外有成百萬的人，他們不知道您的一些言論和事業，却知道您那引為奇談的煙斗。

斯大林：我把煙斗忘在家裏了。

路得維希：我現在要向您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許會使您大吃一驚。

斯大林：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早就忘記驚異了。

路得維希：我們在德國也是如此。

斯大林：是的，你們在德國很快就會不再驚異了。

路得維希：我的問題是這樣：您經歷過許多次的冒險和危險，您遭受過許多次的通緝。您參加過戰鬥。您許多親密的朋友已經死了。您還活着。您認為這是什麼緣故？您是否相信命運呢？

斯大林：我不相信。布爾什維克、馬克思主義者是不相信「命運」的。「命運」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偏見，是胡說，是神話底殘餘，就像古希臘人神話底殘餘一樣，而古希臘人認為命運女神支配着人們底命運。

路得維希：那就是說，您沒有死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嗎？

斯大林：既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兩者結合起來就使我沒有死。但是，不管我死沒有死，在我的位置上或許有另外一個人也說不定，因為本來就必須有一個人坐在這裏。「命運」是一種不合規律的東西，是一種神秘的東西。我是不相信神秘論的。當然有一些使我避開了危險的原因。可是當時也可以發生許多其他的偶然事情、許多其他的原因，這些偶然事情和原因可以引起直接相反的結果。所謂命運在這裏是毫不相干的。

路得維希：列寧在國外僑居過很多年。您在國外住的時間很短。您是否認為這是您的缺點？您認為誰給革命帶來的好處更多：是那些僑居國外有機會直接研究歐洲但却與人民沒有直接聯系的革命者呢，還是那些始終在俄國工作、知道人民情緒但却不很知道歐洲情形的革命者呢？

斯大林：在作這樣的比較時，應該把列寧除外。那些留在俄國工作的人們中間，很少人像列寧那樣與俄國現實情況、與國內工人運動密切聯系着，雖然列寧在國外居住很長時間。我每次到國外去訪問列寧時——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三）——，我總看見列寧身邊擺着俄國實際工作者寄給他的一大堆信件，所以列寧總是比留在國內的人更熟悉俄國情形。他始終認為他住在國外是他的一個負擔。

在我們黨和黨領導機關裏，始終在俄國境內工作而沒有出過國的同志，當然比在國外僑居過的人多得多，他們當然有機會比在國外僑居過的人給革命帶來更大的好處。要知道目前在我們黨內，在國外僑居過的人已經很少了。在兩百萬黨員中間，他們總共不過一兩百人。在中央委員會七十個委員中間，總共只有三四個人是在國外僑居過的。

至於說到認識歐洲、研究歐洲，那末願意研究歐洲的人住在歐洲，當然有更多的機會做這件事情。從這點上講來，我們中間未在國外久住過的人是有某些損失的。可是僑居國外，對於研究歐洲經濟、技術、工運幹部、各種著作——文藝著作或科學著作——並沒有決定的意義。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住在歐洲來研究歐洲，當然要容易些。可是未在歐洲住過的人所受到的損失，是沒有什麼重大意義的。相反地，我知道有許多同志，他們在國外住過二十年之久，住在沙洛頓堡或拉丁區某個地方，在咖啡館裏坐過好些年，喝過啤酒，可是終究沒有能够研究歐洲，也沒有了解歐洲。

路得維希：您是否認爲德國人這個民族愛好秩序甚於愛好自由？

斯大林：過去在德國，人們確實很尊重法律。一九〇七年，我在柏林住了兩三個月，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常常嘲笑一些德國朋友這樣地尊重法律。例如，流行着這樣一個笑

話，說是某次柏林社會民主黨總部預定在某日某時舉行某種示威遊行，四郊各個組織的黨員必須參加遊行。從某一郊區來的有二百人的一個隊伍，雖然在預定時間準時到達了城市，但是沒有參加示威遊行，因為在車站月台上站了兩小時，不敢離開月台；在出口處收車票的查票員不在，車票沒處繳。人們開玩笑地說：需要一位俄國同志給德國人指出一條簡單的出路：不繳車票，走出月台……

難道現在在德國還有這類事情嗎？難道現在在德國人們還尊重法律嗎？看起來納粹黨人自己本應該是最維護資產階級法紀的，他們現在難道沒有破壞這些法律，沒有搗毀工人俱樂部，沒有為所欲為地殺害工人嗎？

至於工人就更不必說了，我覺得他們早已不再尊重資產階級法紀了。

是的，近來德國人已大大地改變了。

路得維希：在什麼條件下才可能在一個政黨領導下把工人階級徹底和完全地團結起來呢？據共產黨人講來，工人階級底這種團結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後才有可能，為什麼呢？

斯大林：由於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階級在共產黨周圍的這種團結是最容易實

現的。但是這種團結無疑地還在革命以前就將基本上實現。

路得維希：野心對於巨大歷史人物底活動是推動力還是障礙物呢？

斯大林：野心底作用在不同條件下是各不相同的。以條件爲轉移，野心對於巨大歷史人物底活動可以是推動力，也可以是障礙物。它常常是障礙物。

路得維希：十月革命在某種含意上是不是法國大革命底繼續與完成呢？

斯大林：十月革命既不是法國大革命底繼續，也不是法國大革命底完成。法國大革命底目的是消滅封建主義而確立資本主義。至於十月革命底目的則是消滅資本主義而確立社會主義。

載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八期

簡要註釋

〔一〕唐·吉訶德(Don Quixote)，或作吉訶德先生，是西班牙大小說家塞爾萬提斯(Cervantes，一五四七—一六一六年)所著小說底主人翁，這是一個自傲的幻想家。他空費力氣來反對想像中的敵人，却不知道實際存在着的真正敵人。——(見正文第三頁)。

〔二〕克拉斯諾夫(П. Н. Краснов，生於一八五九年)，舊俄軍隊底將軍，是科爾尼洛夫大叛亂底參加者。十月革命後，同克倫斯基一起進攻彼得格勒，為蘇維埃軍隊所俘。他立下約言，再不反對蘇維埃政權，遂被釋放。但他去到頓河流域，組織哥薩克反革命隊伍來同蘇維埃政權進行武裝鬥爭，為時兩年之久。——(見正文第六頁)。

〔三〕戈茨(A. P. Gots，生於一八八二年)，是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之一，在十月革命後進行反革命活動，一九二〇年被捕，由最高軍事法庭判決槍斃。——(見正文第六頁)。

〔四〕馬蒙托夫(К. К. Мамонтов，一八六九—一九一九年)，是鄧尼金軍隊底將軍，一九一九年攻佔了沃龍涅什州的一些城市，在紅軍後方進行了很大破壞。——(見正文第六頁)。

〔五〕拉辛(O. T. Pashin，死於一六七一年)，十七世紀俄國農民戰爭底首領，哥薩克貧民底領導者。他在一六六七年領導起義，在羣衆中極受愛戴。後為沙皇軍隊擊敗，逃往頓河，被其兄出賣。一六七一年六月在莫斯科被處裂刑而死。——(見正文第七頁)。

〔六〕蒲加巧夫(В. М. Пугачов，一七四四—一七七五年)，是俄國農民起義(蒲加巧夫起義)底首領。開始在烏拉爾領導起義，自稱彼得三世。在革命運動中起了傑出作用。親自審判地主，參加戰鬥。後為部下出賣，在敵人面前表現了高度革命氣節，最後被處裂刑。——(見正文第七頁)。

〔七〕十二月黨人底起義，指一八二五年的一些俄國的貴族革命家所舉行的公開反對沙皇制度的武裝起義，起義是在那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發動的，故參加此次行動者被稱爲十二月黨人。——（見正文第七頁）。

〔八〕鮑洛特尼科夫（М. М. БУЛОТНИКОВ，死於一六〇七年），俄國第一次農民戰爭時期的農民起義首領。出身農奴，逃亡作船手。十七世紀初年號召農奴起來反對地主貴族和商人，沒收他們的土地和財產。一六〇六年，鮑洛特尼科夫部隊會進軍到莫斯科，圍困該城，但爲其隊伍中的小地主貴族分子所叛賣，退守圖拉，終被沙皇軍隊所俘，處以極刑。——（見正文第一〇頁）。

〔九〕馬薩里克（Tomáš Masaryk，生於一八五〇年），捷克的政治家、哲學家、歷史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爲布拉格大學教授。戰爭時期爲捷克獨立而鬥爭。歸附捷克國家社會黨，雖然未正式加入該黨。一九一八年被選爲獨立捷克共和國總統。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七年兩次又被選爲總統。一九三五年退休。是反法西斯主義者。——（見正文第一二頁）。

〔一〇〕凡爾賽體系，是英國、美國、法國於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粉碎了德國及其同盟者以後所造成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底體系。這個體系底基礎是凡爾賽和約以及其他許多與之有關的條約，這些條約特別是規定了歐洲各國的新國界。——（見正文第一五頁）。

〔一一〕馬克思與恩格斯，「德意志觀念形態」第一部，對費爾巴哈、鮑威爾與斯蒂納所代表的最新德國哲學的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四四二頁）。——（見正文第一七頁）。

〔一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兩卷本，第二卷，一九四八年，第五——三四頁）。——（見正文第一七頁）。

〔一三〕這裏所指的是約·維·斯大林與弗·依·列寧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一九〇六年）上的會見，在倫敦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七年）時的會見，以及約·維·斯大林在國外——從克拉科夫到維也納——的旅程時間與弗·依·列寧的會見。——（見正文第一九頁）。